

比较文学
名家经典文库

杨乃乔 主编

雾外的远音

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

葛桂录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杨乃乔 主编

雾外的远音

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



葛桂录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雾外的远音：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葛桂录著.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3
（比较文学名家经典文库）
ISBN 978-7-5334-6415-8

I. ①雾… II. ①葛… III. ①比较文学—文学研究—
中国、英国 IV. ①I206 ②I56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78766 号

比较文学名家经典文库

杨乃乔 主编

WUWAI DE YUANYIN YINGGUO ZUOJIA YU ZHONGGUO WENHUA

雾外的远音：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

葛桂录 著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350001 网址：www.fe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62027445
发行部电话：010-62024258 0591-87115073）

出 版 人 黄 旭
印 刷 福州华彩印务有限公司
（福州市福兴投资区后屿路 6 号 邮编：350014）

开 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0.5
字 数 462 千
插 页 2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34-6415-8
定 价 7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部（电话：010-62024258）联系调换。

集结与阅读：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经典（总序）

编辑与出版这套《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经典文库》的目的是基于下以几种缘由，在此我们给予简约的陈述。

2013年6月6日，我与董伯韬博士在网络平台上交换一些学术问题，其中提到了关于出版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书系的设想。的确，我们应该为从“文革”结束以来到当下的优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出版一套“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经典文库”（出版时丛书命名“比较文学名家经典文库”，以下简称“文库”），以“文库”的集结形式，为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的崛起与发展给出一种历史性的记忆。

我们在编辑与出版的策略上约定，这套“文库”只收取当代中国优秀学者在比较文学研究方向下能够见证自己学术实力的代表作，每位选入的学者只提交自己的一部代表作。因为我们相信，在一位学者有限的学术生命时段，真正的优秀学者所能够从容沉淀且凭借学术良心推出的厚重著作应该只有一部。我们毫不犹豫地认为，有限的生命在无限的学术中所沉淀的厚重性体验与深度性思考仅此可能获有一次，反之是违背人性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愿意把这部研究代表作称之为见证学术历史的个人经典——“the best of me”。

按照约定的编辑与出版策略，我们对近 37 年来能够准确定位在比较文学学科意识下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进行了遴选，第一批选入了十部专著，作为十位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个人经典给予集结出版。我们在遴选与编辑的过程中，曾得到这十位学者诚恳与无私的帮助。

需要说明的是，这套“文库”仅从过去出版且曾在学界产生过影响的专著中进行遴选，而不再接纳任何在比较文学研究命题下业已出版的论文集。因为显而易见，一位在学术信仰上谨慎且笃实的学者，愿意让自己沉寂在一个相对安静且稳定的时段，就一个论题在文献与理论两个层面做体系性思考而撰写专著，这部专著较之于论文集在逻辑的断片中所给出的阶段性思考要更有价值得多。

此次，我们通过遴选与集结出版这套“文库”，在意外的偶然中，对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 37 年来所行走的学术发展史经历了一次刻骨铭心的反思。

从“文革”结束到当下的 37 年来，中国学界关涉中外文学及其理论、文献的人文研究及所堆积的出版物在表象上也只能如此繁华了，无论怎样，所出版的专著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当我们以选家的眼光透过虚妄的繁华，希望真正拣选若干部还能够被定义为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个人经典的专著时，在遴选的质量与数量上，能够感动我们学术良心的专著居然没有多少部。并且我们特别想说明的是，比较文学研究是一个学科边界开放的学科，所以我们的遴选绝然不是仅仅规限于以“比较”两个字眼儿为自己命题的专著中展开的，因为至少业内学者都知道，“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一部在学科意识上地道且准确的比较文学研究专著往往不需要粘贴“比较”的标签来装饰自己。

我们的遴选涉及了与比较文学交集的相关人文学科及研究领域，本来我们以为能够轻松地遴选出五十种或一百种可以定义在比较文学学科意识下所出版的个人经典，结果却多少有些令人失望。我们不禁想在此设问：37 年来，中国学者在“学术大跃进”的冒进中究竟做了些什么事呢？

然而无论怎样，当代中国学界还有依凭自己的学术良心理性读书且执着研究的学者，毕竟我们还是遴选与出版了第一批结集于“文库”的十部专著。我们还会遴选与出版第二批的十部专著与第三批的十部专著……当然，这一切还要由中

国当代学者在历史的大浪淘沙中以他们的良心与研究来说了算。也正是如此，在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史上，这套“文库”第一批选入的十部专著越发弥足珍贵了起来。

第一批选入的十部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专著至少涉及了以下多元研究方向：如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中日古代文学、英国文学与中国文化、俄罗斯文学及其文化、中日文学与文化研究、中西比较诗学、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西方神学诠释学、儒家经典与诠释学、翻译研究等。

我们从选入专著所涉及的研究方向上不难见出，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为当下中国本土具有国际性比较视域的研究学者打造了一方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与跨学科的开放平台。其实，我们深知这套“文库”的选家策略作为一种立场，实际上，是在为比较文学这个学科的本质潜在地定义，如南朝梁代文学家萧统编纂《文选》那样。

萧统编纂《文选》的选家策略与立场即昭示了那个时代的士人对形式主义审美给予诉求的文学观念，萧统在编纂《文选》时，于经、史、子之外典重于“文”之宏丽的辞藻、和谐的声律与对偶的排比等，这其实是在理论上潜在地昭示了那个时代士人对文学现象及文学本质的定义。一如萧统在《文选序》所言，文学随着时代在改变自身发生与发展的走向，并且在审美本质上的蜕变是难以捉摸的：“式观元始，眇觐玄风，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世质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凜。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①而萧统恰如其分地以选家的策略与立场，把他对文学本质的理解与解释定义在形式主义的文学审美风格上，以铸成了操控那个时代的文学理论观念。

^① [梁] 萧统《文选序》，见于《文选李注义疏》，高步瀛著，曹道衡、沈玉成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册，第6—10页。

需要陈述的是，这套“文库”必然有着选家自身的策略与立场，我们是依据当下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界普遍认同的关于比较文学的学科意识而践行的。其实，能否持有一种当下准确的比较文学学科意识是不容易的，如果我们不陈述这一点，必然会遭遇这样的疑问：一般被理解为是世界文学或外国文学研究方向下的专著为什么会被选入这套“文库”？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西方神学诠释学、儒家经典与诠释学、翻译研究等为什么也会选入这套“文库”？等等……谙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及获有准确的比较文学学科意识的学者，往往会就上述疑问的提出者给出自己简洁且友善的建议：不妨去翻阅一下近年来出版的《比较文学概论》，关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学科理论与学科意识，作为教材的《比较文学概论》讲述得很清楚了。不错，比较文学研究是一门特别需要准确且地道的讲求学科理论与学科意识的研究门类。

而我们在这里是尊重这些疑问的提出者的，并且愿意简洁地回答第一个疑问：汉语学者在汉语语境下的世界文学研究或外国文学研究，说得再确切一些，汉语学者在汉语语境下的英国文学研究或爱尔兰文学研究，在学科本质上就是比较文学研究，无论这些汉语学者栖居在汉语本土是操用汉语作写还是操用外语作写，他们的文化身份、学术视域与价值立场与外域的本土学者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差异性。

说到底，比较文学研究在学科意识上绝然不同于国别文学研究与民族文学研究，我们在此把这两者合称为国族文学（national literature）研究。我们不建议一厢情愿地误用国族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来评价比较文学研究的本体论视域，驻守于国族文学研究的方法论，以集结出版一套“文库”，依凭比较文学研究的本体论视域，以集结出版一套“文库”，两者在交集之间必然会呈现出极大的差异与冲突。我们所论证的比较文学研究的本体论视域就是言指比较视域（comparative perspective）。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倾听国族文学研究者对比较文学研究者的种种评价，甚至某种评价在对比较文学学科意识的误读中呈现出并不内行的批评，其实这也全然没有关系；我们想言说的是，我们始终持有这样一种姿态：即双方应该在相互看视的差异性中相互欣赏，并在相互对话中营构一种大度

且包容的学术心态。我们恳切地宣称：国族文学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础，一位学者首先只有做好了国族文学研究，才可能走向“四个跨越”的比较文学研究。

我们不难发现，选入这套“文库”的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他们首先都是优秀的国族文学研究者。他们在国族文学研究的基础上把视域投向国际学界，投向与文学研究具有交集（intersection）的一个异质学科（heterogeneous discipline），以语际（interlingual）与跨界（transboundary）的整合性思考成就了自己的比较视域及比较文学研究。毫无疑问，他们都坚实且准确地拥有把文学研究带向国际学界的比较视域。真正且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不是可以自己宣称的，也不需要自己宣称，只要他们的研究视域、学术心态与学术成果达向了语际与跨界的整合性逻辑，恰切地吻合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科意识，他就是一位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因为他拥有汇通中外文学及其理论、文献的知识结构，持有两种以上可以阅读的学术语言能力，秉有开放的比较视域与多元的学术心态等。

多年来，不少青年学者在报考比较文学研究方向下的硕士生、博士生时，或从事比较文学研究时，常常提出要导师开具一张在这个研究方向下积累知识结构与锻造比较视域的基本必读书单。从学科性质上来讲，比较文学研究是一门要求很高的学科，由于比较文学研究是在语际与跨界中淡化其学科边界的，因此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下还可以界分出多种从属性研究方向，所以不同于国族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下无法开出一张包打天下的基本必读书单。然而链接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下的从属性研究方向，无论是怎样的开放与多元，任何比较文学研究者均需要准确地获取地道的比较文学学科意识，在这一点上，对任何一位走进这一领域的学者来讲，都是共通且公平的。

我们编辑与出版这套“文库”，也正是希望为相关青年学者提供一套了解与把握比较文学学科意识的基本系列读本，以便比较文学研究的代际性发展能够在准确的学科理论中有序化、学理化与逻辑化的行进。当然，这一学科意识是在不同的比较文学个案研究中呈现出来的。

集结于这套“文库”的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他们是在不同的文学个案

研究中呈现了自己的比较文学学科意识，他们都是优秀的当代学者，他们曾在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发展史的不同阶段，以自己的学术良知留下了个人思考的足迹，所以选入这套“文库”的个人经典，分别在不同的历史节点上见证了那个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讨论隋朝一统天下后南北经学的统一与分野时认为：“学术随世运为转移，亦不尽随世运为转移。隋平陈而天下统一，南北之学亦归统一，此随世运为转移者也；天下统一，南并于北，而经学统一，北学反并于南，此不随世运为转移者也。”^①在学术与世运之间，无论存在着怎样的转移与不转移的历史性与时代性维系，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学术。因此，我们主张读者能够恰切地在学术与世运之间给出自己的选择，带着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维系眼光，对这套“文库”的专著给出自己的阅读、判断与接受。我们再三强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借助于“文库”的集结形式，为希望从事或正在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青年学者提供一张关于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专著的必读书目。这张必读书目还需要仰仗优秀的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对自己的一部个人经典的推介，还需要仰仗出版社推出第二批的十部与第三批的十部……使这张必读书目逐渐地丰富且完善起来，以沉稳地绘出一张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个人经典的学术地图。对于那些希望走进比较文学研究的青年学者及他们的阅读期待来说，我想在未来的坚持中能够遴选与出版三十种或五十种就足够了。

注意，我们在修辞上使用了“the best of me”这样一个术语以隐喻的方法指称“个人经典”，在这套“文库”的遴选与集结的语境下，我们必然要把“the best of me”在逻辑上链接与定位在“canon”的语义场中，而“canon”的汉语译入语就是“经典”。

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中，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以三重定义的方法给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下定义时，在第三个层面上认为：“世界文

① [清]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3页。

学不是文本的一种固定经典而是一种阅读模式（World literature is not a set canon of texts but a mode of reading）。"^①严格地讲，按照学术的形式逻辑规则，任何一位学者在给一个学术概念下定义时，应该使用肯定句式，而必须拒绝使用否定性的语言表达式，因为那种操用否定性的思路以排除与被定义概念无关的诸种元素，最终迂回地达向被定义概念的本质，这无疑是一种反逻辑的思考，这也是形式逻辑在理论上所给予拒绝的。但无论如何，大卫·达姆罗什给予了我们重要的启示。

在全球化时代，那些在世界文学名义下被尊称为经典（canon）的作品，需要处在不间断的被阅读中，以读者的持续性阅读给予作品之经典身份的激活，否则一部被曾经称之为世界文学经典的作品退出阅读后，它只有在寂寞中沉落，失去经典的本质。其实，曾经被称之为学术著作的经典也依然如此。学术著作的经典本质是变动不居的，而不是固定的，它们必须不间断地处在被阅读的理解与解释的过程中，才能被历史的当下性阅读激活且守护其经典的本质。我们编辑与出版这套“文库”，也更是以集中的方式为相关读者提供阅读的方便，使选入这套“文库”的个人经典时时能够处在被阅读与被参考的当下语境中，以此也能够激活与回忆那个时代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发展的学术氛围，同时，也葆有选入这套“文库”之专著的经典性学术生命力。所以仅从这一点不难看出，我们绝然不是在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上固执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经典定义者。

当然，这一切也要依凭选入这套“文库”之专著本然的学术品质。

说到底，学术经典也是一种阅读模式，阅读激活了这些学术经典，也激活了那个时代的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也有效地推动了当下代际性读者的知识积累与学术思考。我们当下所遭遇的是一个拒绝阅读的时代，尤其是一个拒绝纸本阅读的时代，更不要说阅读学术经典了，所以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以修订的再版优

^① [美] 大卫·达姆罗什：《什么是世界文学？》（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81.）。

秀专著与当下的阅读来守护历史上的学术经典呢？

由于比较文学学科边界的开放性，比较文学研究以其大度与宽容的姿态接纳了尽可能多的周边学科及其优秀学者集结于这个领域，比较文学学科边界的开放性不仅推动了比较文学自身的发展，也为相关学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学术心态及其学术信息。

从事比较文学研究需要锻造一种专业的视域，而图书出版也需要获取一种专业的眼光。福建教育出版社愿意以自己盈余的经济实力，资助出版这套纯然学术性的“比较文学名家经典文库”，而不求取出版利润的回报，这着实令人敬重。这是无疑是一种气魄！因为，这个时代有着太多的榨取学者血汗的出版人。

较之于某些出版人招摇着出版论文与专著的学术旗号，在斤斤计较中收取高额出版经费，这种气魄在职业的人格上要伟岸得多；较之于某些出版人为获取高额出版利润，出版媚俗读物以抓取大众眼球，这种气魄在职业的人格上要圣洁得多。

最后，我们感谢推动这套“文库”出版的策划人董伯韬博士与编辑李杨女士，他们为这套“文库”的出版投入了持久的热情与不懈的努力，从他们与这套“文库”作者们的反复交流中，我们全然可以感受到他们对学术信仰的忠诚与守护。时下，愿意和能够在书的审读与设计中投入如此多智慧、学识与心思的编辑并不多。

杨乃乔

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光华楼

2014年7月22日

自序

探讨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的多重联系，是中英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该领域是由我国一些学贯中西的前辈学者，如陈受颐、方重、范存忠、钱锺书等人开辟的。我们注意到，他们在外国著名学府攻读学位期间，大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中国文化在英国的影响或英国文学里的中国题材这样的研究课题。他们对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中国题材及中国形象的研究是我国早期比较文学研究的代表性作品，至今仍然是这一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

陈受颐作为我国最早研究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的著名学者之一，于1928年以其学位论文《十八世纪英国文化中的中国影响》而获得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回国后即任《岭南学报》发表一系列文章，如《十八世纪欧洲文学里的〈赵氏孤儿〉》（《岭南学报》1卷1期，1929年12月）、《鲁宾孙的中国文化观》（《岭南学报》1卷3期，1930年6月）、《〈好逑传〉之最早的欧译》（《岭南学报》1卷4期，1930年9月）、《十八世纪欧洲之中国园林》（《岭南学报》2卷1期，1931年7月）。后来又相继在《南开社会经济季刊》《中国社会政治科学评论》《天下月刊》等国内的英文刊物发表了多篇中英文学与文化关系方面的

论文。其对原始资料的详尽占有与细致解析，以及丰富的研究成果和严谨的治学风格均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为后学者从事本领域的研究工作起了示范和标杆作用。

方重在斯坦福大学的博士论文是《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1931），后来该文的中文本在国立武汉大学的《文哲季刊》2卷1—2期上发表，并收入作者的《英国诗文研究集》（商务印书馆，1939）之中。这是继陈受颐之后我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对英国文学影响的有相当分量的文章。材料丰富，考证详实，分析透辟，富有说服力，是这篇长文的主导特色。该文详细记录了英国人对契丹（Cathay）的热忱幻想以及当时英国作家对中国题材的取舍利用，体现了著者非常扎实的研究功力和以实证材料见长的影响研究特点。其贡献在于第一次为我们勾画了十八世纪英国作家借鉴中国题材的脉络，提供了一幅英国的中国观念图。

以博学睿智著称的钱锺书先生在中英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方面同样取得了令后学叹服的成绩。他从清华大学毕业后，作为庚款留学生，直接进入牛津大学。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写出了一篇极见功力的长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通过毕业考试，于1937年获得牛津大学的文学士（B. Litt.）学位。该文后来在《中国文献目录学季刊》（*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1940年第1卷和1941年第2卷上发表。这篇洋洋数万言的长篇英文论文，一如钱锺书其他所有著述，旁征博引，左右逢源，通过书信、游记、回忆录、翻译、哲学思想史著作，以及文学作品等无数的材料，最翔实系统地梳理论述了至十八世纪末为止英国文学里涉及的中国题材，并对其中的传播媒介、文化误读以及英国看中国的视角趣味的演变等都做出深入的剖析，而成为我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经典个案。关于这两个世纪里英国作家涉及中国题材的材料，均被钱锺书先生搜罗殆尽，为我们继续深入研讨这一课题，提供了最详尽的英文文献资料来源线索。钱先生在全面考察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中国题材后得出的诸多令人信服的结论，更值得我们关注，它们揭示出了这两个世纪里中英文学关系最本质的特征。

在这些前辈学者中，范存忠先生对中英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用力最多，成果

也最丰富。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他就开始研究十七、十八世纪,特别是启蒙运动时期的英国文学及中英文化关系问题,其研究成果很快为中外学术界所瞩目。1931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题目为《中国文化在英国:从威廉·坦普尔到奥列佛·哥尔斯密斯》(*Chinese Culture in England from Sir William Temple to Oliver Goldsmith*)。其后在《金陵学报》1卷2期发表长论文《约翰生,高尔斯密与中国文化》(1931),以及其他文章。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他这方面的成果更是精彩纷呈。如《十七八世纪英国流行的中国戏》(《青年中国季刊》2卷2期,1940)和《十七八世纪英国流行的中国思想》上下篇(《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1卷第1-2期,1941),论十七、十八世纪中国戏剧对欧洲的影响和诸子百家等所代表的中国思想对欧洲的影响。1944年,范存忠先生应邀赴英国,在牛津大学讲学一年,提交论文多篇,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古代哲学、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对西方的影响。这些成果陆续在《中国文献目录学季刊》(*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英国语言文学评论》(*The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等英文期刊,以及《文史哲季刊》《青年中国季刊》《思想与时代》等刊物发表后,在英伦文学批评界引起很大反响。新中国成立后,范存忠先生继续在中英文学与文化关系领域辛勤耕耘,先后发表了《〈赵氏孤儿〉杂剧在启蒙时期的英国》(《文学研究》1957年第3期)和《中国的思想文物与哥尔斯密斯的〈世界公民〉》(《南京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两篇重要文章。新时期以后,范先生又相继发表中英文学与文化关系方面的多篇重要文章。范存忠先生去世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了由范夫人林凤藻教授作序的范先生遗著《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这本集大成的中英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的经典著作,内容极其丰富,涉及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引证有关中外文资料三百多条,文字简洁生动,深受海内外学者的好评,充分体现了他“明确而具体”的研究风格。已故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教授称该书为“研究中英两国文化交流的不朽之作”。

毫无疑问,以上这些著述奠定了中英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的坚实基础,无论是文献发掘整理还是在文本分析探讨方面,都取得很高成就,许多方面是后来的

研究者难以逾越的。特别是这些前辈学者的研究套路至今仍然是我们应当仿效的榜样。不过，我们也注意到，上述这些研究成果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其研究范围都设定在十八世纪及其以前的中英文学与文化交流关系，至于十九世纪以来中英文学与文化之间更为丰富的撞击交流的史实却涉及甚少，甚至尚未触及。在此学术背景下，作为后辈学子，我对自己确定的学术方向是重点研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希望能在前辈学者开辟的道路上有所拓展。

这种学术雄心的确立，当然离不开我在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钱林森教授的鼓励与指导。正好宁夏人民出版社邀请钱先生主持一套“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出于对我的鞭策和厚爱，钱先生让我撰写“英国卷”。对我来说既是个机遇，更是个挑战。我开始认真拜读上述前辈学者的著述，循着他们的学术思路，阅读着那些难啃的英文原著，同时就我所接触到的材料，补充了他们没有或涉及不多的内容。在此过程中，前辈学者那渊博的知识与睿智的分析均令我茅塞顿开、受益甚丰。写作过程中的艰辛，在我的另一本小书《他者的眼光：中英文学关系论稿》（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的后记中有所记述。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如期完成撰著工作，于2002年8月以《雾外的远音——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为题名出版。

该著原有六部分22小节。第一部分为英国作家感知中国文化之始，论述了《曼德维尔游记》里的历史与传奇、英国作家笔下的契丹和契丹人形象；第二部分阐述了英国作家的两种中国文化观，具体分述了十七世纪英国作家对中国文化的“解剖”、威廉·坦普尔对孔子学说与园林艺术的推崇、笛福眼里的中国形象、英国作家对中国文化的嘲讽与批评；第三部分介绍了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热，包括英国作家与中国园林艺术，约翰逊眼里的中国文化，艾狄生、斯蒂尔对中国文化的利用，英国作家对“中国戏”的改塑等；第四部分阐述了英国作家浪漫之梦里的中国文化，如柯勒律治残篇里的神奇国土、兰姆美文里的中国景观、德·昆西笔下的梦魇中国等；第五部分介绍了英国作家“中国梦”的实现与回味，如迪金森对中国文化的理想信念、毛姆的傲慢与偏见等；第六部分阐述了英国作家跨文化对话的理念与尝试，具体介绍了罗素对中国文化的忧思与期望，以及李约瑟

试图重塑西方人关于中国的信念。通过上述内容，试图较为全面地考察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之间那丰富而复杂的精神联系。

当然，由于这套“跨文化丛书”每卷有一个相对统一的字数要求，也由于交稿时间紧迫以及英文资料翻译消化等因素，原定的写作计划并未全部完成，不少内容只能暂且割爱。书里没有涉及或涉及不多的内容，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英国文学里的中国题材：1793-1945》里有较详细的论述。加之在该书第一版刊行之后又有一些后续研究成果，所以想找机会收入全书，一并接受学界同仁和读者诸公的赐教。非常感谢杨乃乔教授和福建教育出版社，将我这本旧作，列入“比较文学名家经典文库”丛书第一辑出版，让我能趁该书修订的机会，及早实现了十多年前研究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关系的完整思路，同时让我有机会再次回味当年写作本书时的学术青春岁月。

作为开启自己在中英文文学交流研究领域垦拓的第一学术专著，我对该书寄予了更多的热情与希望，也知晓它有不少亟待完善之处。不过总算初步实现了自己的一些学术构想，花了一大半篇幅论及十九世纪、二十世纪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成为当年学界比较全面考察中英文文学与文化关系的著述，展示出了中英文文学交流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

本书书前有季羨林、王元化、汤一介、杜威·佛克玛等学术大家的题词插页，以及乐黛云先生为丛书写精彩《序言》、钱林森先生的长篇《前言》。这次修订时因“比较文学名家经典文库”丛书编辑统一要求，均不收录。

2002年8月，在南京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所组织的专题圆桌会议上，《雾外的远音》及丛书先期出版的其他几卷，得到包括佛克玛、叶维廉、乐黛云、严绍璵等多位中外学者的关注与好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称其为：“创新之作。它承前启后，具有无可取代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必将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一个里程碑。”同样在全国知名的南京先锋书店举行的首发式上，包括本书在内的丛书亦得到时任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主席的日本东京大学资深教授川本皓嗣先生的高度评价，称其为：“纵观这套丛书的内容，以平等对话的精神，把握世界各文化圈与中国之间‘冲

突与融合’的历程，我感慨很深……它们既是中国比较文学的成果，也是亚洲比较文学研究全体值得自豪的成果。”前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主席，时任荷兰乌特勒支大学教授的杜威·佛克玛先生说：“这套丛书旨在继续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间的对话。它既强调差异性，也强调相似性。其内容显示出不同文化族群的某些类同性，或者说是不同的文学观念在不同的社会中有其共通的东西。”（2002年5月24日给丛书的题词）比较文学前辈学者叶维廉先生则以其关于不同文化间文化关系状态的精辟描述表达了他对“跨文化丛书”内在价值的认定与赞许。叶维廉先生认为：“两种文化的交往，应是各自保持一种张力，而不是一种征服一种……跨文学丛书的写作，体现的正是一种不同文化间平等对话的精神与气度。……这套丛书可以流传下去。”

确实，促进中外文化之间的互动交流，把陌生文化当作一面镜子，在双方的对话中更好地认识自己，更好地反省和完善自身的民族性格，这是人类文化交流的理想。这也正是本书撰著的目标所在。丛书的学术顾问季羨林先生为丛书题签：“我一向有一个看法：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如果没有文化交流，我们简直无法想象，人类今天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在精神方面的交流中，文学的交流实占有重要地位。”王元化先生亦曾为这套跨文化对话丛书题签“橐籥罔穷”。语出陆机《文赋》，意义深邃。陆机《文赋》用以论文：“同橐籥之罔穷，与天地乎并育”。丰富的文辞如同风箱鼓风（或，宇宙间的元气自然流通）一样，没有穷尽，与天地般同生命永存。《老子》第五章亦云“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意即天地的空间就像一个大的风箱，一推一拉，一呼一吸，引申为太虚的元气在宇宙间自然流行。这就是说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你来我往，犹如风箱一推一拉，一呼（送出去）一吸（拿来），有如宇宙间的元气自然流行，不可阻挡。同为学术顾问的汤一介先生也写道：“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里程碑。”在人类文明交流发展互补共存的大背景下，对中外文学与文化关系进行整体研究及由此而对人类文明交流发展做总体历史审视，是今天的时代赋予文化研究者和出版者的历史使命。2003年丛书获得第18届北方十五省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后经出版方推荐，参加第36届英国伦敦国际